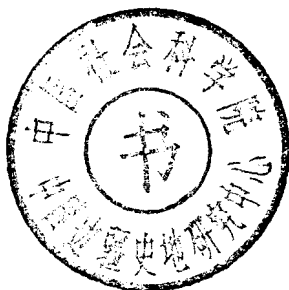


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



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昆明

责任编辑： 李惠铨

封面设计： 刘福海

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68,000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1116·144 定价：2.80元

前 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1956—1986年)。

云南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一九六三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与科学分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合并，改名为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直属省领导。

“文革”期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被迫停止工作。一九七二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恢复工作，暂由云南大学代管，对外仍保持独立。“文革”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划归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领导。一九八〇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直属省社会科学院领导。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内的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南亚)两个研究室独立为东南亚研究所。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内的民族学、民族史两个研究室独立为民族学研究所，宗教研究室独立为宗教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此外，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

单位的业务骨干，不少人曾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过。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是我国省属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中成立较早的一个研究机构。在已经走过的三十年历程中，它在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为了纪念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检阅我们的科研成就，我们特从曾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的人员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不包括专著）中，挑选二十八篇，汇编成《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编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目 录

前言.....	(1)
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侯方岳 (1)
在实践中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黄惠焜 (11)
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与历史发展 规律问题.....	杜玉亭 (19)
论氏族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	刘达成 (39)
论从母权制家庭到父系制家庭的变革及其内在矛盾	宋恩常 (53)
云南少数民族“异辈婚”初探.....	谭乐山 (67)
试论基诺族农村公社的特点.....	王 军 (84)
云南陇川邦瓦寨景颇族“家务建设”的历史考察	李景煜 (106)
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	桑耀华 (120)
关于白族族源问题.....	王叔武 (135)
诸葛亮“南征”的若干问题.....	宁 超 (159)
云南傣族社会由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	颜思久 (177)
布朗山布朗族的原始宗教.....	王树五 (190)
略论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化.....	和志武 (218)

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 朴素观.....	李国文(243)
略论纳西族心理素质特点及其变异因素.....	郭大烈(261)
普米族的汗归教.....	杨学政(275)
彝族史诗的朴素辩证思想.....	夏光辅(294)
云南沧源崖画.....	林 声(304)
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	陈吕范(322)
宣光、临洮战役初探.....	龙永行(338)
杜文秀初期活动的性质及其起义的直接原因.....	林 荃(361)
云南各族人民收回七府矿产的胜利斗争.....	荆德新(369)
论蔡锷.....	谢本书(382)
辛亥革命在云南.....	孙代兴(406)
简论一二·一运动.....	蒋中礼(419)
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	陈 茜(434)
华侨对越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秦钦峙(448)

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侯方岳

一、资产阶级民族学与民族学家

欧洲古代历史著作中，只有一些零碎的民族学资料。欧美民族学，是近代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而发展兴盛起来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亚、非、澳海上交通的发展，西欧对海外殖民地的进军，各国资产阶级如何征服、奴役美、亚、非、澳落后民族，成为欧美资产阶级日夜思考的难题。欧美各国政府官员迫切需要对世界各落后民族的地理、历史、语言、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社会家庭组织、宗教、道德、风俗、习惯，进行全面了解，以便对各落后民族或直接进行武力征剿，或煽动进行互相残杀，或麻醉其意志和精神使之恭顺屈服；总之，通过流血和不流血的（所谓“文明的”）手段，达到其肮脏的目的。欧美殖民政府官员，多数是经过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测绘学乃至神学训练的，因此他们担任一定时期殖民地官员后，都能写出一定数量的学术著作。如果单纯从其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也像广闻博见的学者，有一定学术价值，这是不应抹杀的；但他们大多是欧、美、日殖民政府公开的官员，或接受殖民政府资助的人员；他们有些人的公开职务确是“学者”、“旅行家”、“神甫”、“牧师”，但绝大多数都有特殊使命。

他们生活及其活动的金钱，多是直接、间接地来自殖民政府。尽管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有所谓“进化学派”、“播化学派”、“心理种族主义学派”、“功能学派”……等，他们所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有所差别，但他们的基本目的都是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所以西方民族学常常又叫做“应用人类学”、“行政人类学”。

真正从事民族学学术调查研究，对民族学学术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如路易士·亨利·摩尔根……等是比较稀少的。由于摩尔根是比较纯正的学者，他对落后民族不是歧视而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甘当落后民族人民的义子，客观地调查研究其社会状况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成为自发的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百年来尚无人全面地超过他。但不少资产阶级民族学家，不是认真学习摩尔根，而是尽力贬低他。

资本帝国主义，从征服落后民族的目的出发，所训练的民族学家，虽然其学识比较广博，他们总脱离不了歧视落后民族的观点，他们的手法总离不开猎奇取异、秘密侦察，有的甚至盗窃文物，骗偷珍宝，破坏古迹，乃至直接参加侵略。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西资本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侵略我国，企图宰割而瓜分之。他们派遣了大批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学者、考察团、外交人员，进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大量的地形测绘、民族调查和资源探索。如沙皇俄国在新疆、内外蒙古、东北，日本在东北、内外蒙古，英、美在西藏、新疆、云南，法国在云南、广西，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们污浊的足迹。如：

查哈罗夫（1814—1885年）：1839年作为俄国传教士团团员到北京，即以传教为掩护作情报工作，搜集我国从西北到东北边境地区的民族情况和地理、资源材料。1851年他参加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谈判，为沙俄入侵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他

以有功于沙俄，而被任为沙俄驻伊犁领事。他对汉文、满文、北方各民族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西北乃至整个北中国和中俄边疆两侧地形测绘和记述，是空前详细的，每一条小山岭、小河流和居民点，几乎都无遗漏，为沙俄侵占我国西北和东北1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作好了充分准备，他确实对沙俄的侵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贝尔：1891年由英帝派到印度殖民政府工作，1900年派驻锡金，专门调查西藏地理、物产和民族情况。1904年随同杨哈斯班德率军远征拉萨。1908年起任驻锡金专员，更深入调查研究西藏情况。1913年中英西姆拉会谈时，他十分活跃，1920年正式出使拉萨，收买达赖喇嘛及大批西藏贵族。他所编著的《藏语语法》、《英藏口语辞典》、《西藏宗教》等著作，确有学术价值，但他的金库里藏有大量西藏金块，他的灵魂深处充满了鲸吞我国西藏的密谋；所谓“麦克马洪线”和中印边境的长期纠纷，主要是根据他与麦克马洪的阴谋造成的，他敌视中国人民，是资本主义的功臣和宠儿。

戴维斯：他的著作《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1909年英国出版），也是相当有名的。他从1894年至1900年曾四次窜入我国云南、贵州、四川……等省，长期从事间谍活动。他是英国印度殖民政府的少校情报局局长。当英国完成占领缅甸后，英帝亟欲从缅甸进占云南，进而进占四川，以与长江西上的英国炮舰配合占领整个长江流域。所以他窜入云南，绝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学”研究，而是实地勘测云南地形，调查云南交通、民族、语言、风俗、物产，为英国侵略军远征作准备（后因与法、日、美等国发生矛盾，其阴谋才未实现）。因为他是别有用心，所以他虽有大量的实地调查材料，仍不可能忠于科学研究，而是有意识地重复拉古伯里的谬论：“中国人不是他们国家的任何部分的最早占有者”，为资本主义的侵略制造口实。

吴迪：他的著作《暹罗史》也是有点名气的，甚至被一些人捧为权威著作，其第一章《泰人古代史》，全是抄袭拉古伯里及其盲目追随者的一些臆造材料和错误观点，大肆杜撰：“泰族受中国人的压迫而被驱赶南移”（见吴迪《暹罗史》31—40页）。其目的也是挑拨中泰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吴迪本来是英国驻泰国清迈多年的总领事，长期参与英国侵略东南亚的活动，后转而“研究”泰国史，中泰关系史，以其所谓“学术著作”，为其侵略阴谋服务。

杜德：他的著作《中国人和暹罗人的关系》、《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也相当有名，也被捧为权威著作。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长期在泰国北部从事“传教”活动的“牧师”，他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从他的自供和著作中就充分暴露其真面目。他非常狂妄地宣称：“从南中国海向北延伸包括安南和柬埔寨、云南、四川西部、甘肃，以及西至西藏、东至广西和贵州”，是“世界上最广袤的未占领地区”（《泰族——中国人的兄长》，1923年美国衣俄华出版，第161页）。这就是他野心的自供。他为了实现其野心，从1910年至1918年间，多次窜入我国南方各省，进行所谓“实地调查”，他根据其长期“精心”挑选的二百五十个泰语词汇表格，在我国南方各民族语言中作一些所谓“比较研究”，只要发现当地语言中某些词汇的发音与泰语略同或相近，就一概断定为“泰语”，把讲这种语言词汇的人一律武断为“泰族”。照他这个简单办法，不仅可以把欧洲几十个民族断定为一个民族，而且可以把新西兰的毛利人断定为我国彝语支各族中任何一个民族。（因为1963年一位新西兰的毛利人的学者，曾来云南路南石林附近五棵树村彝族人民中作过语言调查，他曾发现彝语中有几十个词汇与毛利语词汇发音相同或相近。）近现代语言学者，对各民族语言对比研究时，除语法外，搜集基本词汇最少要1500个，乃至2000个以上，才能进行初步的比较研

究，才能作初步的科学结论，而杜德这位所谓“历史学”、“民族学”家，仅凭主观挑选的250个词汇，就妄自作出结论，说中国南方各民族都是“泰族”，甚至胡说汉族压迫泰族从长江两岸南迁，用《天方夜谭》的描绘方式，编制了一篇2500年汉族压迫泰族七次南迁的神话故事，其最后一次是所谓公元“1234年大理府的伟大的南诏王国”“被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人推翻”（见杜德该书第9—18页）。其中除个别地方是篡改、歪曲中国历史外，绝大部分是主观编造。

为了驳斥拉古伯里、吴迪、杜德及其追随者的论调，1978年第2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杜玉亭、陈吕范合写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英、泰诸国报刊相继翻译转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一部分人表示，要独立地重新研究泰国历史与泰族历史，从拉古伯里、吴迪、杜德的反科学系统中解脱出来。从1959年以来，我国接待泰国学术界人士七八次之多，双方交换了论据和意见，特别是他们参观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南诏历史古迹文物后，不少人都表示要认真研究我们的观点和史料，不能盲从西方旧说。开展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有助于廓清西方“学者”长期造成的混乱。

总之，对于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学和民族学家，都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

二、旧中国的民族学

殷、周、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古文字和古典文献，已有民族学的零星材料，司马迁的《史记》有民族学的系统记录，但未形成“民族学”。

近现代的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西方的“民族学”也传入了中国。首先是我国名教育家，曾留学德国的蔡元培

先生，从1926年开始，将西方进化学派的民族学介绍入我国，以后其他学派也相继传入我国，曾出现不少民族学家。他们鉴于东西方帝国主义各派的大批人员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调查，也努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在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任院长，从成立“民族学组”到“人类学组”。他们认为民族学不仅是纯学术的理论科学，也认识到民族学与实际政治、特别是边疆民族的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便相继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蒙藏委员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边胞服务社……等机关挂钩，获得经费资助，开展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他们的调查内容涉及体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宗教学……。他们中最有成就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对马、恩、列、斯的民族学著作，也是很少接触的。因此他们的实地调查总是囿于西方的陈规，有些人的体质测量的手段很不文明，有些人研究描写的内容十分烦琐无聊，特别是对各民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往往一无所知，如民族学最有成就的陶云逵、凌纯声，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次数相当多，时间相当长，地区相当广，对山区彝族农奴制残余，对傣族典型的农奴制及变质的而组织完整的农村公社，对其他后进民族的农村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以及藏族极落后的典型的农奴制，则基本不了解。他们的调查方法完全摹仿他们师傅的故技；他们研究的结论，很少超出其师傅一步，对其师傅的谬论更谈不到批驳。当然，我绝不是否认其中许多民族学家，在艰苦劳动中，对民族学也曾作过一定贡献，不能一概抹煞，但即使比较进步的纯正的民族学家，创造性也是不多的。

三、马列主义民族学及其在苏联的实践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很重视民族学、

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综合研究的；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马克思一生在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有关民族学的书籍，都认真读过，如哈密顿关于美国民俗学，米勒关于阶级分化的学说，皮克林关于人类种族学，德布柔斯关于拜物教，梅纳斯关于宗教学等等著作，斯坦弗斯·莱弗尔斯的《爪哇史》等。马克思还在忙于《资本论》写作以及重病缠身时，对拉伯克的《文明起源和人类原始状态》，梅因的《古代制度讲义》，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农村》，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束》，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详细的摘要。恩格斯对巴霍芬、麦克米伦、拉伯克、法森、霍伊斯勒、毛勒、格罗特、班克罗夫特等人的著作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也花很大精力进行研究。马克思死后，他立即放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毅然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仅以几个月短暂时间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学宝库增添了伟大的篇章。可见恩格斯早有成竹在胸，否则焉能如此高速度高质量完成这一天才巨著。

列宁在忙于俄国社会历史研究和直接领导俄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十分重视，他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等大量著作。斯大林在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民族学和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的研究，1913年斯大林发表《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这一著作，从民族学和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方面来说，都是水平很高的。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他马克思著作所阐述的氏族、氏族公社、部落、农村公社、部族、古代民族、古代国家直到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和近代民族国家，就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学、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的科学体系。

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著作中，继续发挥1913年《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论点，批判了梅什柯夫等企图加上第五个特征（具有自由单独的民族国家）的错误观点。

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除进一步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外，探讨了语言学、民族发展的远景——社会主义民族和世界民族融合等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是苏联一些民族学家，并不重视民族问题理论研究与民族政策的执行，口头上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囿于老沙皇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族学老框框，对世界民族志和民族分布图方面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在民族学一些细节上有所发挥，在理论上似无较大的成就。

苏联民族学现在已蜕化为新沙皇强制推行俄语和强制推行大俄罗斯民族同化政策效劳，宣扬什么苏联“国民经济共同体”，社会主义“各民族进一步接近”，走向“民族融合”，形成什么“际族共同体”、“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甚至为其征服全人类，鼓吹要形成什么“统一国际人类共同体”，妄图由全苏联各民族的俄罗斯化，达到全世界的俄罗斯化。现代苏联的民族学研究，基本上是为新沙皇全球战略服务；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纯正的民族学家是极少的。

四、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

我党历来是重视民族研究的，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立了民

族研究机关。解放战争时，待解放地区我党的地下组织、游击队的领导机关，强调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培养民族干部，团结各族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配合解放大军迅速解放全国大陆。

解放初期，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进行民主改革等，对各民族社会经济普遍都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各民族社会经济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和方法，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只有局部地区发生了比较曲折复杂的斗争。同时，有选择地对各民族自称、他称、历史、语言、文字、政治、法律、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婚姻丧葬、风俗习惯也进行了基本调查，为解决民族识别创造了条件。五十至六十年代，又进行过比较大规模大范围的调查研究。

新中国建立三十余年来，在民族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虽还没有建立起我国的民族学体系，但我们绝不可妄自菲薄，以为我们一切都不如外国。我们过去三十余年的民族研究，强调了经济基础，这是我国民族研究的一大优点，这是任何国家、任何学派民族学都不能相比的。其次，我们将民族学与民族史结合起来调查研究，这又是我国一个优点，外国民族学家，也很少有超过我们的。第三，我们把民族学、民族语言乃至考古学也初步结合起来了，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下去。第四，比较薄弱的是关于家庭、婚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艺美术、服装、发式、衣、食、住、生活……等等方面；把这一方面补充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活材料还很多，立即抓紧调查补充，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补足这一方面的缺陷。

同时我也认为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应将汉族包括在内，不能完全离开汉族来孤立研究少数民族，因少数民族与汉族（包括古代的华夏）四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互相影响的。国内民族学研究也要和世界民族研究配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好研究世

界各民族社会发展共同的规律性和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孤立地只研究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否定世界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显然是不恰当的。

研究世界各民族社会发展时，也应与中国汉族的社会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因汉族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三千年来对世界各民族曾发生过不小的影响，马克思在1863年一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把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与传入欧洲，说成“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也说：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之于学术，火药之于战争，指南针之于航海，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任何宗教或任何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简单地说，没有这三大发明（加上造纸术，是四大发明）经印度、阿拉伯西传，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新大陆的被发现，没有西欧封建骑士制度和领主割据制度的崩溃，因此也就没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形成。

总之，在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的征程中，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有广阔前景的。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于中外各旧民族学派，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总结解放以来我国民族学调查研究的经验教训，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我国民族学，乃至世界民族学研究作出贡献。

（原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8月版）